

中国现代性的重新审视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多维解读

□王文奇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近年来伴随着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努力,国际学界对于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注越来越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重新思考中国何以在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衰落下去,中国又将以何种形式寻找或者塑造自身的现代性。这方面的著作有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以及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等等。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在众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个人对中国的所见所感,重新思考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特色进行了着重分析。尽管该书的理论深刻性与论据充分性较之前提到的几本影响广泛的学术著作有所不及,但该书却以通俗易懂、娓娓道来的方式,为读者展开了多维思考的空间。

一 中西分野:必然与偶然

对于中国在近代的衰落,不仅中国人想找到其根源所在,以便吸取历史教训,重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人也想寻找到其原因,以便重新审视全球化,为现代性道路寻找更为真实的解读。于是,中西分野的必然与偶然就成为了核心议题。

西方中心论的强势地位曾经无可动摇,在这一分析路径或者说叙事方式的掌控之下,东方包括中国的衰落都被认为是必然的现象。西方被看成是文明的世界、发展的世界;东方则被看成是蒙昧的世界、停滞的世界。在两种世界的对立之中,很显然,前者影响甚至征服后者就显得顺理成章,这也是殖民者从西方世界走向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重要理论说辞。当然,这种叙事方式的形成,有着部分对历史的真实解读。如亚当·沃森所说,“在19世纪,欧洲人使整个世界卷入了一张由经济联系与战略联系编织的大网,欧洲人使世界连为了一个整体,通过扩展欧洲体系为今天的全球体系奠定了基础并继续主导规则的制定。”^①

这种以特定历史时空的相对强者确定的叙事方式,也得到了非西方世界一些国家的回应。一些国家在构建主权国家,寻找自身生存价值的时候,希望割裂与自己的历史传统的联系,因为其认为历史传统代表着陈腐与落后,西式道路才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即使被马丁·雅克看成是保存了独特东方传统的日本,也有很多学者选择了西方的叙事方式,如日本近代著名学者福泽渝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②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其立意在于强调非西方向西方的学习与师从,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对以殖民与被殖民、征服与被征服为主的互动进行了价值观上的肯定,从而将欧美体系的全球扩张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当学者们重新审视全球化中的东方,尤其是审视1800年前后真实的中国时,人们对中西分野的必然性论断有了动摇。贡德·弗兰克考察了中国清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在18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是全球的白银秘窖。而在马丁·雅克看来,虽然在18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相对于当时西方世界最为强大的英国来说,已经在发展模式上表现出劣势,但“1800年的中国经济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在各个方面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活力;中国社会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农民体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商人拥有极强的商业敏锐性”,客观地衡量当时的全球经济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1800年,全球经济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实际上它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亚洲、欧洲和美洲共享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其中

^①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65.

^② [日]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①。

通过对 1800 年这个时间节点上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中西分野的偶然与必然?马丁·雅克也强调,西方的崛起不过是近 200 年的事,如果我们把中西分野或者非西方与西方的分野,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时空中来考察,近 200 年的欧美国家的强大不过是历史的例外。如果伴随着现今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崛起,非西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所在,那么欧美国家近 200 年的例外就将在历史中被定格。如此,重新反思中西关系乃至非西方与西方关系的视野也将为之一变。这种反思最终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性道路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二 现代性道路:一元与多元

传统上关于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被界定为以下几组关系:文明—野蛮、冲击—回应、中心—边缘、帝国—依附、现代—传统。虽然这样几组关系侧重的层面有所不同,但背后基本都蕴含着统一的结论,即现代化应该是西方化,现代性道路就是要走向西方的一元化道路。中国尽管是非西方世界的一员,但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构建起来的叙事框架内,中国也只有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现代化。但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的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同样能够通向现代化。关于这一点,马丁·雅克在书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阐述。

马丁·雅克指出,西方国家“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的西化程度如何”^②,然而,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中尽管可以寻找到一些西方的影子,但其自身的特色更为明显,“过去和未来,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存在于东亚现代性中。它既非常年轻又无比古老,这种自相矛盾的特质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延续至今,但是现在,像上海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又是最年轻最具活力的”^③。马丁·雅克更明确指出,应该先将中国看作一个文明,之后再看作一个民族国家,这样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现

①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 页。

② 同上书,第 12 页。

③ 同上书,第 89 页。

代性的特色。

当我们运用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这些概念以一种表面上整齐划一的方式去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忽视了当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甚至是鸿沟。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去审视世界,我们会发现在民族国家的外衣之下,展现的是不同的国家实体。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在经历了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欧美国家的政客与学者们正在想方设法修正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中的确出现了佼佼者,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集体崛起,在欧美看来这是“他者的崛起”,然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同样存在着张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共性问题几乎存在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之中。而那些发展艰难的国家,已经被欧美的学者称之为“失败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但却与现代化的进程长期脱节。

面对着这些巨大的差异,我们只有回望历史,或者跳出因循已久的西方叙事语境,从其他的视角重新审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道路,才更具意义。曾经,新教伦理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信念动力,而东方的儒学传统并不能够促成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但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引发的世界瞩目,人们才承认儒家伦理、集体主义精神恰恰是东亚和中国成长的重要动力。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西方化的改革,但实践证明,这些改革因为没有考虑到非洲和拉美国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特性而遭到了失败,也一次次证明一元化的现代性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认真审视各国的具体历史与现实,结合自身特色,发展中国家才能够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经济奇迹无疑向世界证明了多元现代性的正确。同时,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阔步前行,又引发了另一个激烈的讨论,即中国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的地位,全球范围内的权力转移是否已悄然发生?

三 权力转移:实然与应然

马丁·雅克在书中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乐观图景,他认为“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

权”^①。在马丁·雅克看来,“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大国,也许最终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甚至假以时日成为最重要的超级大国”,不仅如此,“到那时,中国也会像之前的那些大国一样,用本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世界,并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世界,摆脱之前受到的种种束缚”^②。

马丁·雅克这种对中国的展望,也是其他一些学者的共识,因而对于当下国际格局中的力量对比,一些人提出了权力转移的说法,当然这种权力转移的论断集中在当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权力向新兴大国——中国的转移。伴随着美、欧、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比重的相对提升,“毫无疑问的,在国际关系中,一些专家开始将权力转移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及其同侪身上。”^③

当然,从现在全球权力对比的实际状况来看,美国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在全球范围内鲜有与之匹敌者。如果考虑到权力的多面性,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说的“强制性的联系性权力和间接的结构性权力”^④的差异,或者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在命令式权力之外,同化性权力”^⑤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会发现,传统意义上权力转移理论所认为的大国间力量的再分配是否已经发生很值得推敲,因为即便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美国,甚至在高盛公司关于金砖国家的猜想中,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中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组织的管理以及科技文化等软实力方面仍较美国逊色。中国目前所思考的是如何融入世界以及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谐共处,而不是充当现有国际格局的挑战者与国际体系的重塑者。

但这种实然的现实依然无法阻断分析家们对于未来权力对比的应然判断,对于权力转移的探讨声浪也越来越高。对美国来说,中国远景中的应然地位是它不愿见到的,这也成为它遏制中国或者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国会遭到当前超级大国的遏制,但很多学者又认为中国成长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这种发展趋势就像当初西方征服东方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就坦言,“从长期来看,无

①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185页。

③ Steven Chan, “Is there a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different faces of national power”, *Asian Survey*, Vol. 54, No. 5, 2005, p. 688.

④ [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⑤ 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81 – 182.

论一时发生什么样的曲折,这一长期趋势——他者的崛起——都只会加速推进”^①。

对于假想中国成长为超级大国之后的世界,马丁·雅克得出的结论与那些中国威胁论者迥然有别。中国威胁论者衡量中国未来的发展时,多是秉承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以零和博弈的视角去考量未来世界秩序的安排。但马丁·雅克却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中寻找中国的世界性思维,所以在他看来,当中国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时,东亚的朝贡体系会再现甚至扩及全球。当然,这种朝贡体系的再现不是说中国压制其他国家,重新建立中央王朝与附属国的关系,而是强调因为中国更加强大,“国际间被拉大的差距培育出了潜在的稳定性。”^②而这一点,在产生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的欧洲那里,曾是相反的:一旦有国家强大起来,就要对周边国家展开征伐,所以欧洲大陆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定以来,出现了无数次战争。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会为国际关系准则的重塑注入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为我们全方位展现了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在多个层面引发了我们对于中西分野、现代性选择乃至权力转移的深入思考。从马丁·雅克的分析视角上审视中国的飞速发展,我们会看到现代性的多元化不仅应该得到肯定,更应该成为共识;中国的崛起将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甚至会成为全球稳定的助推器。而一旦中国真如应然图景那样,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么在未来,重新回首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我们甚至会发现西方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的短暂胜出只是历史的偶然状况,而远非他们今天自身所宣扬的那样,是必然的结局。

①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赵广成、林民旺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②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